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4-0029-07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张曼玉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本文在对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福建省46个村的调研数据,从社会资本总体情况和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互惠规范、关系网络、社会信任)考察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对收入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且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维度对生计策略选择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大的退养户其收入低于年轻退养户,且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

关键词: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生计策略;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4.05

随着国家逐步加大养殖污染治理力度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南方水网区生猪退养户群体因此日益扩大,继而出现退养户需重新选择生计策略的局面。生计是建立在资产、能力和活动等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生计策略则是人们为了达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做出选择的范围及其组合,生计策略的选择对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而中国在传统上便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在此背景下,深刻体现退养户群体特征及制度背景特征的社会资本成为研究退养户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视角^[2]。社会资本产生于人们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资源交换与情感关系,主要是由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三个方面所组成,人们交往的网络结构主要分为结构洞、结构封闭,这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都能产生社会资本^[3-4]。

目前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的对收入、就业寻找、经济绩效等问题^[5-6]。例如,章元、刘林平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而有的学者提出社会资本对收入具有显著影

响;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人们找到工作机会,社会资本维度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至少相当于教育或人力资本的作用^[7-13]。但较少文献以退养户为研究对象,更少文献从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出发,探讨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和社会资本总体情况对退养户收入和生计策略分别有何影响。

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我国农村社会比较注重构建基于家庭之上的人情关系网络,农村中的“人情”可以带给人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社会网络越发展,社会资本存量越高。在这样的关系社会中,退养户的家庭收入、生计策略选择与其生活中的社会资本是不是存在联系以及存在怎样的联系正是本文研究兴趣所在。为此,本文利用福建省364个退养户的调查数据,就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填补目前关于退养户文献研究以及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生计策略选择文献的空白,进而为政府关于退养户就业问题等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收稿日期:2018-06-25

作者简介:张曼玉(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本文信息:张曼玉.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2(4):29-35.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 社会资本与劳动力收入研究

自从 Bourdieu、Coleman 和 Putnam 等人先后提出并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以来,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领域尤其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许多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在改善收入甚至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作用^[14-15]。

由于退养户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比较缺乏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不过目前可以借鉴的是对农民工这方面的研究^[16-22]。从理论上来看,目前许多学者已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收入水平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基本上都是从社会资本单方面探讨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23-24]。例如,唐灿、冯小双考察“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工资的影响;孙立平主要研究“整合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也有学者从总体上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叶静怡、衣光春认为社会网络不仅在减少搜寻工作成本方面有影响,而且对提高收入水平也有重要影响。更有研究提出,因为非市场互动的存在,市场均衡的结果将根据社会地位和收入对人们进行分层,会出现所谓的“群分效应”,因而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和公共品消费等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5]。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年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二) 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

目前有些学者做了生计策略方面的研究,但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可供借鉴的是对职业获得的研究^[26-30]。在社会资本领域,社会网络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研究,个人的社会网络影响其职业获得的结果是其核心命题。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采用两种思路:第一种是考察个人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与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考察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与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普遍支持了这两种研究思路,即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在寻找

工作过程中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分别与个人职业获得结果之间存在关联^[31]。社会资本可帮助那些由于信息不对称或逆向选择问题而不能识别求职者特征的企业筛选员工,雇主也动用社会网络资源来获取潜在雇员的信息,许多企业都会给被推荐的职位申请者机会。社会资本有利于人们找到工作,赵延东通过对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作用相当明显,具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下岗职工不仅能更容易获得再就业机会,也更可能找到好工作^[32]。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退养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选择非农生计策略具有正向影响。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生计策略体现农户对生计资本利用的程度和经营活动的选择,生计策略选择适当,才能够实现生计目标。Scoones 认为生计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单一依靠农业生产的生计策略,农业生产的集约型或粗放型不仅要依靠土地的肥沃程度,还要依靠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生计多样化,生计多样化关注非农生产,如从事副业、外出打工或经商等^[33]。本文根据延平区和龙岩市农民生计活动的实际情况,将退养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两类:以农业专业型为主的生计活动和以非农为主的生计活动。本文以生猪退养户的收入和生计策略选择作为因变量,将它们作为实证分析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其中收入是连续变量,生计策略是 0—1 虚拟变量,0 代表选择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1 代表选择以农业专业型为主的生计策略。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包括三个维度: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由于社会资本各个维度的变量都是虚拟变量,通过对以上社会资本变量进行加总平均后,获得社会资本存量总水平的测度。本文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各维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作为实证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健康状况。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y_1, y_2 = f(x_1, x_2, x_3) \quad (1)$$

$$y_1, y_2 = f(x_1, x_2, x_3, x_4, x_5, x_6, x_7, x_8) \quad (2)$$

$$y_1, y_2 = f(x) \quad (3)$$

$$y_1, y_2 = f(x_1, x_2, x_3, x_4, x_5, x_6) \quad (4)$$

上述(1)式是社会资本存量的三个维度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2)式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存量的三个维度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3)式是社会资本存量总水平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4)式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社会资本存量总水平对因变量影响的模型。

(二)数据说明

围绕主题,本文借鉴了代表性文献(Han)的测度方法,并根据生猪退养户实际情况设计问卷^[34]。为保证问卷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作者首先进行了预调研,2017年5月在福建省退养户比较集中的南平市延平区,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取30份问卷。根据被调查对象反馈的信息和变量测度的信度检验,修正了问卷中题目的选项设置和表达方式,形成正式调查问卷。在2017年七八月份,分别到猪栏拆除比较典型的南平市延平区和龙岩市进行调研,并在调查前进行培训以保证调查质量和效率。本次调研调查地点包括46个村。此次调研总共发放380份问卷,剔除无效样本(数据空缺或前后矛盾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64份,有效率为95.78%,其中南平市延平区回收280份问卷,龙岩市回收84份问卷。

(三)样本描述

调查发现,福建省生猪退养户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51.83岁和6.37年,可以看出,退养户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或许是由于退养户人群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不高且农户的受教育意识也比较薄弱所导致的。从表1中可以发现,退养户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社会资本总量均值达0.72,其中,互惠规范均值0.76,关系网络均值0.68,社会信任均值0.7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退养户社会资本较多,但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退养户居多,一方面或许是由于退养户教育水平、年龄和生存技能的限制,致使其选择对文化和技术要求较低的农业型生计策略,另一方面与退养户的身体状况也密切相关,可以发现退养户健康状况均值达0.83,符合农业型生计策略对退养户身体状况的高要求。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退养户的收入水平较高,经了解,由于是在退养初期获取的数据,退养户刚好领取以两百块一平米为标准的退养补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退养户的收入水平此时较高。表1是模型变量说明及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模型变量说明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生计策略	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1;以非农为主生计策略=0	0.69	0.46
年收入对数	年收入(原单位:元)的对数	12.27	0.78
社会资本	所有具体社会资本变量加总平均所得结果	0.72	0.34
互惠规范	能否与村民相互帮助:能=1;否=0	0.76	0.43
关系网络	与所来往的村民关系如何:自评关系好=1;自评关系不好=0	0.68	0.47
社会信任	村民是否值得信任:是=1;否=0	0.72	0.45
性别	性别:男=1;女=0	0.96	0.20
年龄	岁	51.83	9.21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数(年)	6.37	3.46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程度低=0;自评健康程度高=1	0.83	0.38
地区	南平市=1;龙岩市=0	0.77	0.42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估计模型之前,本文已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检验表明,各变量VIF

(方差膨胀因子)值均低于2,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由于横截面数据回归普遍存在异方差问题,所以本文直接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heteroskedasticity-ro-

bust standard error)进行统计推断^[35]。由于收入是连续变量,所以采用 OLS 回归分析,而生计策略是二分变量,因此采用 Logistics 回归分析。模型 1 只加入了社会资本分维度变量,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地区这 5 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建立的,模型 3 只加入社会资本总体情况,模型 4 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所建立的。

(一)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根据表 2 的估计结果,退养户社会资本对退养户收入回归系数为正,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退养户的社会资本存量高会使其收入增加,退养户社会资本是其一种隐性资本,其所拥有的人脉关系等对其各方面都会有潜在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资本丰富退养户的收入高于社会资本匮乏的退养户也不难理解。从表 2 可以看出,退养户的关系网络对其收入的影响也在 1% 的水平显著为正,这说明退养户关系网络越发达,其收入越高。在调研访谈中也有发现,关系网络

丰富的退养户在投资经营方面要比关系网络贫乏的退养户敏锐且其信息来源多而广,这直接影响退养户选择最优工作方式以实现收入最大化。表 2 中退养户互惠规范对收入的回归结果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示退养户互惠规模越大、越遵守规范,其收入越高。中国是关系型社会,非常讲究人情世故,受到帮助必将给予回报。在这种环境下,退养户之间会形成相互促进的氛围,相互介绍彼此的人脉,其社会网络也会因此越来越发达,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收入因此要高于互惠规范差的退养户。从表 2 的统计结果来看,社会资本维度中的社会信任对退养户收入并无显著的影响,这或许与中国农村的大环境有关,中国农村民风淳朴,居民之间彼此熟悉、信任度普遍较高,尽管如此但人以群分现象普遍,社会资本丰富的退养户平时会更更多地与社会资本丰富的村民交往,因此社会资本匮乏的退养户并不能真正融入社会资本丰富的退养户群体中,因而其收入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表 2 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影响

变量名称	因变量:退养户年收入对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社会资本	—	—	0.413 8***	0.425 0***
互惠规范	0.210 7**	0.203 2*	—	—
关系网络	0.286 2***	0.292 2***	—	—
社会信任	-0.056 8	-0.046 2	—	—
性别	—	-0.172 0	—	-0.198 6
年龄	—	-0.014 8**	—	-0.014 7**
受教育状况	—	-0.005 4	—	-0.003 2
健康状况	—	0.140 9	—	0.127 8
地区	—	-0.107 3	—	-0.098 4

注: *、**、*** 分别表示 10%、5%、1% 显著水平。资料由作者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后整理得到。

(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表 3 中社会资本的系数在 1% 的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存量越高的退养户,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高意味着其人际关系各方面较为发达,村民对其信任度比较高,得到其他人各方面的支持也比较多,这为其选择非农生计策略奠定了群众基础。退养户在这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群众基础之上,对于生计方式的选择自然就比社会

资本存量低的退养户多了许多,也因此其选择就不再局限于只依靠体力的农业生计方式,更多的是选择依靠多方面能力的非农生计策略,从纯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访谈中不难发现,退养户们对非农生活非常向往,他们认为非农不仅是一种体力解放,更是生计策略的一种升级,很多退养户由于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不得不选择农业型生计方式,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做的选择,这也印证了实证结果是有现实基础的。从表 3 中可以发现,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关系网络在10%的水平显著为负,这说明退养户关系网络越发达、互惠程度越高、对村民越信任,其更愿意选择非农生计策略。退养户对村民越信任就越放心与他们共事、相互交流就业创业的信息,而不仅仅再局限于“一亩三分地”的劳动中,这是社会信任程度高的退养户选择非农生计策略的一大助力,研究表明,信任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并减少干预或纠正不诚实行为的需求(James等);降低甚至消除了控制或契约的需要^[36]。而非农生计策略对退养户的社会交往能力要求明显高于农业生计策略,社

会交往能力强的退养户比较活跃,在枯燥乏味的农业劳动面前显然很难坚持,这种特征就决定了社会交往能力强的退养户更愿意选择非农生计策略,某种意义上,他们认为非农生计方式能发挥其独特价值,这是社会交往能力弱的退养户所不具备的。在我们调研访谈中也可以发现,关系网络丰富的退养户在号召力以及人员调配方面在村里都比较有权威,大家也很支持他们,这在关系社会中比较普遍,研究表明(陆铭),人更愿意支持自己熟悉的人,这是退养户选择非农生计策略的一种推动力。

表3 退养户各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变量名称	因变量:退养户生计策略选择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社会资本	—	—	-1.948 1***	-1.962 4***
互惠规范	-0.721 3**	-0.770 6**	—	—
关系网络	-0.538 2*	-0.559 8*	—	—
社会信任	-0.768 9**	-0.731 3**	—	—
性别	—	0.626 2	—	0.585 4
年龄	—	-0.030 4**	—	-0.030 2**
受教育状况	—	0.024 9	—	0.024 5
健康状况	—	-0.294 1	—	-0.289 1
地区	—	0.538 4*	—	0.547 6*

注: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水平。资料由作者通过 STATA 软件计算后整理得到。

(三)其他控制变量对退养户收入和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表2回归结果显示,退养户年龄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退养户年龄越大,其收入水平越低。由于调研的时间是在退养初期,退养户这时候的收入包括了退养补贴,退养补贴与其养殖规模大小密切相关,年龄大的农户由于精力、体力各方面状况不如年轻人,其养殖规模自然比年轻农户小,退养补贴也就少,因此在收入上就呈现出年龄越大的退养户收入越低的情况。退养户性别、受教育状况与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这些个人特征对退养户收入影响不大,这或许是由于调研对象的健康程度和受教育水平差异不大所造成的。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退养户年龄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

略;控制变量地区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南平市的退养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一方面,调研样本主要集中在南平市;另一方面,南平市的非农资源较龙岩市更为丰富,这是南平市退养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的重要原因。从调研结果来看,虽然退养户总体健康状况在中等偏上水平,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身体状况不适合从事繁重的农业活动,且年龄大的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要高于年轻退养户,这更有利于开展非农生计策略。我们的访谈中发现,由于年龄大的退养户在生活、养育子女等各方面的压力要远低于年轻退养户,因此年龄大的退养户更倾向于选择轻松一些的生计方式。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福建省退养户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总体情况以及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互惠规

范、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分别考察了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收入越高,其中退养户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影响其收入较为突出。第二,总体来说,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显著,且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维度对生计策略选择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高意味着其人际关系各方面较为发达,这为其选择非农生计策略奠定了群众基础,社会资本丰富的退养户在这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群众基础之上,更多的是选择依靠多方面能力的非农生计策略,从纯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年龄大的退养户其收入低于年

轻退养户,且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大的退养户其身体状况不适合从事繁重的农业活动,另一方面年龄大的退养户其生活压力远小于年轻退养户,因此其更倾向于选择轻松一些的生计方式。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启示:第一,需要加大对农村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强退养户家庭与内外部的联系程度,整合农村现有民间组织资源,在交际过程中培育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提升退养户个体社会资本等,最终形成主体信任、沟通协作和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第二,加大对退养户的技能培训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缓解当前退养户生计困难问题。第三,完善退养户创业就业补贴制度,减少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后顾之忧,进而更好的实现生计可持续。

参考文献:

- [1] Chambers R, Conway 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J]. IDS Discussion, 1992; 296.
- [2] 郑世忠, 乔娟. 农户社会资本及其对借贷行为的影响[J]. 乡镇经济, 2007(12): 64-67.
- [3] (法)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4-56.
- [4] Burt R S.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22): 345-423.
- [5] Zhang X, Li G.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31): 315-331.
- [6] Hellerstein J K, Mc Inerney, D Neumark. The importance of residential labor market network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1, 29(4): 659-695.
- [7] 章元, 陆铭. 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J]. 管理世界, 2009(3): 45-54.
- [8] 刘林平, 张春泥. 农民工工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J]. 社会学研究, 2007(6): 116.
- [9] Knight J, Yueh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8(3): 389-414.
- [10] 叶静怡, 衣光春.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10(1): 143-144.
- [11] 刘林平.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112-124.
- [12] 翟学伟.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 社会学研究, 2003(1): 1-11.
- [13] Whiteley P F.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J]. Political Studies, 2000(48): 443-466.
- [14] Abdul-Hakim R N A, Abdul-Razak, R Ismail. Does social capital reduce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erengganu, Malaysia[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0(14): 556-567.
- [15] Grootaert C, G Oh, A V Swamy.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Burkina Faso[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2(1): 4-38.
- [16] 王春超, 周先波. 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 ——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J]. 管理世界, 2013(9): 55-68.
- [17] 叶静怡, 周晔馨.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0(10): 34-46.
- [18] 何国俊.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1): 57-58.
- [19] 李树苗.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 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J]. 当代经济科学, 2007(1): 25-26.
- [20] 章元, Mouhoud, 范英. 异质的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 来自中国的证据[J]. 南方经济, 2012(2): 4-5.
- [21] 周晔馨.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 ——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2(7): 84-85.
- [22] 叶静怡, 薄诗雨, 刘丛, 等. 社会网络层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身份定位模型的分析[J]. 经济评论, 2012(4): 31-32.
- [23] 唐灿, 冯小双.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 社

会学研究,2000(4):72-73.

[24]孙立平. 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50.

[25]陆铭,张爽.“人以群分”: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文献评论[J]. 经济学(季刊),2007,6(3):991-1020.

[26]王娟. 山区农户最优生计策略选择分析——基于滇西南农户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4(9):97-107.

[27]陈卓,续竞秦,吴伟光. 集体林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及生计满意度分析[J]. 林业经济,2014(8):36-41.

[28]A Soltani. Poverty, sustainability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Zagros, Iran[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2(79):60-70.

[29] Tesfaye Y.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role of forest income in participatory-managed forests of Dodola area in the bale highlands, Southern Ethiopia [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1 (13): 258-265.

[30]朱建军.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 农业经济问

题,2016(2):49-59.

[31]魏永峰. 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问题与研究方向[J]. 浙江社会科学,2009(5):107-108.

[32]赵延东. 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J]. 社会学研究,2002(4):43-44.

[33] 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 IDS Working Pape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72-75.

[34] Han S. Compositional and contextual associ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self-rated health in Seoul, South Korea: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evidence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80): 113-120.

[35](美)伍德里奇. 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M]. 王忠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0-45.

[36]James H, Sykuta M. Property right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er-owned firms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2005(4):545-580.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Income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Zhang Manyu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income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on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total social capital,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46 village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income, and the reciprocal norms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lso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income. The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livelihoods strategy choice, the higher the stock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the more inclined they are to choose off-farm livelihoods strateg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of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Aged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have lower income than young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and the older the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the more they tend to choose non-farm livelihood strategies.

Key words: pig-breeding retired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come